



样样丰收、社社增产的紅安县

——介紹中共紅安县委的领导方法

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样样丰收、社社增产的紅安县
——介紹中共紅安县委的領導方法
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編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开·1印张·22,000字
1968年2月第1版
1968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00,000
统一书号：T3106·80
定 价：(5)0.09元

序 言

王任重

1957年紅安县在农业生产上获得了“样样丰收，社社增产”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举。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。紅安县的经验证明：抓住粮、棉、油主要作物增产的同时，可以使各种作物样样丰收；可以消灭落后乡、社，实现社社增产。我們介绍过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，现在又編了这一本小册子，介绍紅安县委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。

从端正思想，转变作风开始。1956年下半年，曾經有过一陣妖风邪气，从资产阶级的墓地里吹出来，当时有不少的干部，中了“闹名利”之风，染了“图享乐”之气。这种妖风邪气同样在紅安县出现了。当时在县級机关里流传着“四多”“三愿三不愿”的说法。所謂“四多”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，打篮球打牌的多，穿大衣的多，吃食堂的多。所謂“三愿三不愿”：就是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；愿坐办公室不愿下乡下田；愿和乡、社干部打交道，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。有些干部被派下乡，也是“人在乡下心在

城里”。有些駐社干部工作不深入不艰苦，“白天睡大觉，夜晚熬死人”。由于领导干部工作不深入不艰苦，因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不高；大吃大喝的风气和资本主义活动在农村抬头。针对这种情况，紅安县委根据党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，表揚了艰苦奋斗的先进人物，批判了贪图享乐的个人主义，打击了妖风邪气。采取了“干部下放，思想下放，层层下放，分片包干，参加生产，领导生产，包工包产，长期固定，年終結賬”的組織措施。由于县委进行了有效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，而且县委負責同志以身作則带头干，因此迅速地鼓舞起广大干部的革命热情，轉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。两道乡支部書記，看到县区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生产，感动的說：“我們这些人，忘了打长工的出身，摆起了当老爷的架子。”干部脫掉鞋袜参加生产，领导群众掀起了大規模的冬季生产运动。这就为1957年的样样丰收，社社增产創造了条件。

参加生产、领导生产，最好的办法是搞試驗田。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每天忙于参加生产、但是忽視了领导生产。劳动一天背痛腰酸，可是对于一区一乡一社的全面情况不了解，抓不住問題，找不到领导生产的办法。紅安县委在实践过

程中，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（新洲、麻城等县也是在先后差不多的时间里找到了这种办法）。领导干部搞试验田的办法，是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最好的办法。通过试验田，使干部在实践中学会生产知识，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；通过试验田做出样子，使试验田成为推行技术革新的旗帜；通过试验田使领导干部、技术干部和当地有经验的农民三者结合起来，取长补短，互相学习，这样就真正做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，科学技术知识和当地固有的先进生产经验相结合。这样做就比较容易打破保守思想的障碍，又能够避免技术改革上的主观主义、命令主义。干部搞试验田的方法，是在农业生产方面领导方法上的一个创举。只要坚持不懈地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就能克服我们领导机关、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。

人们做事情，必须有决心有干劲，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。有了正确的方法，才能增强决心，鼓舞干劲。许多干部有领导农业生产的热情，但是方法不对头，因而往往“吃力不讨好”甚至“好心办成坏事”。1956年我省这样的事例很多，教训应当牢记。还有一些领导干部，陷于文牍主义、事务主义的泥坑。开不完的会议，办不完的公文，不调查不研究，

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。群众說这种领导方法是“坐飞机，放大炮”。还有些领导机关、领导干部，抽象地談論中心工作和部門工作相結合，点面結合等等，但是对于如何組織各个部門为中心工作服务，又如何完成中心工作的条件下，带动各个部門的工作，沒有采取統一安排和具体的組織措施；沒有建立起統一领导下分工負責的責任制度。因而各部門不是通力合作，而是互相矛盾，互相埋怨。紅安县委、麻城县委都是采取了党委統一领导、統一安排、統一使用力量、于部分片分业专人负责的办法，“人人有事做，事事有人管”解决了这个問題。关于点面結合抓两头带动中間的問題，紅安县委采取了抓重点、抓落后、抓新事物的办法，实现了社社增产，粮食、花生大面积平衡增产。他們十分重視总结先进經驗和及时推广先进經驗（抓重点抓新事物）。他們对于抓落后，采取了层层負責一綫串珠的办法，使落后乡、落后社、落后队、落后田、落后苗迅速赶上先进。因为县委采取了这样的领导方法，又有坚持不懈的一股干劲，才得到了“样样丰收、社社增产”的偉大胜利。我們希望全省各个县委都要認真地学习紅安、麻城等县的领导方法和革命干劲，切实改变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。通过整风运动，彻

底粉碎妖风邪气，打破自滿保守思想。只有干部思想作风的大转变、大跃进，才能有农业生产的大跃进。

一年来，红安县的干部作风，在县委同志以身作则的带动之下，有了显著的转变。从“人在乡下，心在城里”转变为“人在城里，心在乡下”、“人在社里，心在田里”。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开始由外行变成了内行，和农民群众有了感情，对农业生产发生了兴趣，爱上了田地、爱上了劳动、爱上了庄稼。因而占店乡的群众对于乡支部书记的评价完全改变了：“黄书记去年是老婆的卫士，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务员”。有的干部被群众讽刺为“检查官”“洋苞儿”“杨外行”“摆来摆去象个相公”，现在被称为“技术员”“杨内行”“杨队长”了。过去群众对某些干部穿着鞋袜，站在田坎上检查生产有反感，现在要求干部去看看，去帮助了。一年的时间，红安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有了这样大的转变，这样大的进步；由此可见那些比较落后的县，如果能够学习红安县委的领导方法，加强对于干部的思想教育，又采取具体的组织措施，就一定能够在不久的时间之内，使广大干部思想和作风得到根本转变；使工作的落后状态得到迅速转变！因此希望那些暂时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的党组织，要有信心、有决心！

要尽可能快地改变领导方法，改变工作作风，放下官僚架子，拿起镰刀锄头，脱掉鞋子袜子，参加生产领导生产。放手发动群众、带动群众，向先进地区看齐。

红安县委、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，虽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，有许多问题还须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创造补充或修改，但是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，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。红安、麻城两县都是老苏区，人民群众有优良的革命传统。红安县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，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：“发扬革命传统、争取更大光荣”，在1957年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再来一个生产大跃进！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红安跃进！

波澜壮阔的生产高潮已经在全省开展起来了。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竞赛，正在进一步鼓舞着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。我们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责任是要站在运动的前面，有决心、有干劲、有毅力，采取正确的方法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无穷力量，满腔热情地领导运动前进，保证运动健康的发展，争取我省农业生产全面的大丰收！全面的大跃进！

1957年12月31日

目 录

序 言.....	王任重 1
样样丰收、社社增产的紅安县	
——介绍中共紅安县委的领导方法.....	1
样样丰收，社社增产	1
干部下放，思想下放，社社有人办	4
干部培育試驗田.....	9
抓重点、抓新事物、抓落后、抓全面	17
实行“三統”、“三包”，中心、部門工作齐做好	20
再来一个生产大跃进	23

样样丰收、社社增产的紅安县

——介紹中共紅安县委的领导方法

样样丰收，社社增产

正在党中央号召农民組織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候，紅安县1957年的农业生产已經先期跃进了一大步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丰收。全县中籼稻、双季稻、一季晚粳、大麦、小麦、泥豆、紅苕、元豆、花生、油菜、芝麻、棉花、大豆、蕎麦、小杂粮等15种农作物，样样丰收；732个合作社，社社增产。

这个县播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，总产量已达30 805万斤，比丰收的1956年增产将近2成，比1955年增产将近4成，平均亩产已达808斤，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(修正草案)1967年长江流域粮食的增产指标；花生产量已达2 825万斤，比1956年增产2成半还多，比1955年增产近6成半，平均亩产已达800斤；生猪共有162 000头，平均每戶将近2头，比1956年增加了1倍半还多。副业收入总值比1956年增加将近1倍半。

全县有3个粮食千斤区，17个粮食千斤乡，其中有一个乡平均亩产高达1 200斤，313个粮食千斤社；花生亩产800斤的有128个社，其中达到千斤的有3 267亩；皮棉百斤乡一个，百斤社21个；生猪平均每戶4头的有41个社，平均每戶3头的有102个社，平均每入一头的有28个社。

农民夸耀1957年的丰收景象是：“稻谷似黄金，花生滿畝青，

棉花白如銀，生豬一片黑，社員滿面紅。”

但是1957年紅安縣並不是“風調雨順”的年景。

紅安縣1957年遇到了持續80天的嚴重乾旱和其他災害。紅安縣人民在黨的領導下，開展了緊張的抗旱鬥爭。這裡只舉兩個突出的例子：一個是在9月上旬，水岩多的水塘干涸、小河絕流，庄稼眼看要枯死。全鄉300多個青年積極分子，整整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，在縣境內的一條大河上筑了一道50丈長、8尺高、1丈5尺寬的攔水大壩。全鄉出動了3500多人，架上水車，擺了10多里路長，把大河的水搬到了小河里，又從小河里搬到塘里、田里，5天之中灌滿了6條河壩和2000多亩田，保證了全鄉3600多亩田和870亩地獲得了豐收。另一個是新寨鄉新一社，原來預計1957年要比1956年增加收入34.1%，可是嚴重乾旱勢必影響這個計劃的完成。群眾惶惶不安，等待觀望。縣委委員、縣法院院長張書元馬上領導社員算了一筆賬，如果不設法抗旱，將要減產4萬多斤稻穀，2萬斤雜糧，近3萬斤花生，每戶平均要減少收入41元多。這筆算了以後，大大激發了群眾抗旱保秋的决心，馬上動員、組織了87節水車，把4里路以外的嚴家田大堰的水車上了神樹崗。張書元同志親身參加車水，累病了還不休息，帶動了全社97個從未出工的婦女，也參加了車水，87對夫妻共同出工與旱災作鬥爭，連89歲的張奶奶也在幫着澆地。經過7天7夜，全部受旱作物獲救，保證了預定增產計劃的圓滿實現。

全縣80多天的抗旱運動，每天平均都有95000多個男女勞動力、15000乘水車、42000担水桶、19部抽水機（日夜工作）。抗旱勝利後，許多社員都說：“合作社力量大如天，兩個多月沒下透雨，還是個豐收年，我們日夜抗旱沒睡覺，還是沒有白費力。”農民越發相信：“在共產黨領導下，沒有辦不到的事情；听

共产党的話，沒有錯的。”

紅安人民用同样的英雄气概，战胜了沒有肥料、飼料等一系列的困难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，以活生生的事实，順利推行了技术改革，改变了耕作制度，打破了保守思想，扫清了丰收道路上的障碍。

农业生产的全面丰收，保证了全县732个合作社，社社增产。有19个社增产达到50—100%，增产最少的社，也都增产5%。全县余粮社由563个增加到701个；缺粮社由92个减少到5个。

全县农民收入大大增加。1956年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45元多；1957年增加到60元多，社員的实际收入比1956年增加31.96%。据10个乡149个社统计：在19639戶社員中，只有3.25%的戶减少了收入，增加收入的戶占88.87%；1957年和1956年分配的同一时期比較，存款戶由21000戶增加到26000戶；困难戶由17732戶减少到8443戶；信用社存款，由125万元增加到160万元。农民留用粮（包括增产粮），由631斤增加到640斤；食油、食肉每人都比1956年增加一斤左右。农民的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有了相应的改善。

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也显著地增加。公积金由1956年的440多万元，增加到840多万元；公益金也由1956年的260多万元增加到440多万元；生产投资1956年平均每亩土地扣除4.4元多，1957年平均7.3元多。这就为合作社的进一步巩固和1958年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，打下了較雄厚的物質基础。

1957年出售給国家的粮食，由1956年的1900万斤，增加到4000万斤；出售給国家的油脂（折合），由1956年的214万斤增加到280万斤（其中包括供給全国各地的“紅安直生花生”种900万斤到1000万斤）；出售給国家的肥猪，由1956年的16000

头增加到18300头；公粮、統購、公債任务，都比1956年提前两个月超額完成，其他經濟任务，也都可以按时和超額完成。

干部下放，思想下放，社社有人办

干部下放，对于保証紅安县农业生产大跃进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1956年紅安县增产以后，干部普遍滋长着麻痹松勁情緒。撤区并乡后，农村干部少了，有些干部又不安心农村工作；有的机关干部下乡，抱着临时观点，沒有作长期在农村工作的打算。“人在乡里，心在城里；人在社里，心在机关”。在县級机关里，流傳着“四多”、“三愿三不愿”的說法。所謂“四多”，就是“騎自行車的多，打籃球打牌的多，穿大衣的多，吃食堂的多”。所謂“三愿三不愿”，就是“愿到先进社，不愿到落后社；愿坐在屋里办公，不愿到田間生产；愿和乡、社干部打交道，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。”县委委員18人，經常下乡的只有3人，至多不过7人。有些县級机关的领导干部，缺乏面向农村，为农民服务的观点，按时上班，照例休假，給农民增加了很多麻煩和不便，农民群众很不滿意。例如：两道乡乡长为了到县邮电局交涉架設电话綫的問題，在外面等了个把鐘头，无人理会，說是“沒有時間”，等到有時間，又說：“下班了”。乡长很惱火。所以以后邮局到两道乡找他接洽工作的时候，他也說“沒有時間”。等一会他又說：“我下班了！”两道乡乡长的这种戏剧性的报复行为，反映了农民对于县級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滿情緒。有些县級机关的领导干部不愿下乡，有的甚至“被迫”下乡，也是“人在乡下，心在城里”，县級机关有一个局长，下乡三天就向乡干部說：“我要回到城里去剃头”，乡干部說：“我們給你找个好剃头师

傳，”他說：“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，”鄉幹部說：“我們給你找個好洗澡盆，”他說：“我要回到城里去換衣服”……就這樣，騎着自行車溜回來了。由於上面領導的不深入、不具體，下面幹部也照樣學。從上到下，都習慣於用“開會”的辦法解決問題。“會議多”的現象又出現了。永河鄉支部書記陳開枝一個月開了26天會，影響了他那個鄉里的勞動出勤率只有60%。許多幹部不安心農村工作，認為農村工作沒有“前途”，因而在工作中深入不下去。金牛區的工作員張漢興，工作消極，好吃、好穿、好玩、好睡。在甯台鄉工作9個月，住了14個社，社社都不歡迎他。前程社社員給他編了一首順口溜：“張漢興，不成人，白天光睡覺，夜晚熬死人。”許多合作社無人過問。桐柏鄉聯盟二社連年減產，駐在這個合作社里的副區長韓維，就是一個所謂“挂名辦社”的人。1956年，是合作化的第一年，大家都缺乏辦社經驗。這是事實。但是，領導的不深入、不具體，一部分幹部不安心農村工作，不熱心辦社，也是事實。因此，這一年全县合作社當中，減產社占10.7%，增產很少（5—10%）的社占30%。

針對上述情況，县委認真地學習了八屆二中全會的指示，初步改進了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。加強了黨和農業社的具體領導。精簡上層、下放幹部，由縣到區到鄉，層層充實了領導力量，社社派住了幹部，長期住在農村辦社的幹部，由過去的100個人增加到412個人，加上鄉幹部，共有902人，做到了社社有人。有的社有好幾個幹部，每鄉平均都有15—23個幹部。县委的措施對於幹部下放、思想下放、教育幹部熱愛農村有重大的意義。

紅安县委1956年11月的一次县委會議上，再次根據八屆二中全會的精神，和下面幹部對县委的批評意見，進行了深刻的檢查，對於县委的不深入實際、單凭會議領導，光叫下面做，自己不做樣子的官僚主義、主觀主義作了揭發和批判。县委走

出了办公室，跳出了會議的圈子。經常下乡的县委委員增加到14人，并且都是长期住在合作社里，深入生产队，脫脚下田，領導生产。这对于广大干部影响很大。县委副书记張景田在廻台乡金星一社为社員挑水澆油菜，全乡有17个干部都参加了生产，掀起了全乡2000多人的抗旱保苗运动；两道乡支部書記看到县里的领导干部参加了生产，很快就脫掉了他的呢帽和鞋袜，还批評自己說：“我們这些人忘記了打长工的出身，摆起了当老爷的架子。”在领导干部的带头下，全县10900个干部，97%已經参加了生产，組織了大规模的冬季和春季的生产运动，超额完成了兴修6000口塘，和3000万担积肥的任务，还超额完成了26万亩冬播計劃。1957年春天，在总结去冬工作的基础上，县委进一步转变作风，贯彻层层下放，固定干部长期办社的办法。县干部下放到区（乡），乡干部下放到社，社干部下放到队；从县级机关中抽調176名优秀干部，长期下放；留在机关里的干部，也实行了輪班短期下放的制度。乡干部下放到社的有87名，社干部下放到队的有1240名；并下放了15名較强的区委級干部担任落后乡的乡总支書記或副書記，在176个落后社里，配备了195名較强的区、乡干部，加强了落后地区的领导。县委要求所有下放干部必須长期在农村生根，不开会不回县，日夜和农村干部、社員在一起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不做好工作不罢休。三月初，县委办公室也从县城搬到重点乡去办公。办公室与重点乡密切配合，指揮生产更加实际、具体。在广大干部中形成了在农村安家落户，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、深入生产、领导生产的新的风尚。

干部下放前后，县委进行了艰苦的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。紅安县的作法是，在干部中持續不断地开展向模范人物、先进思想的学习和討論。教育干部向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看齐，这

是启发干部思想觉悟；克服干部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个好方法。例如有的干部怕艰苦，不愿下放；有的干部怕知识分子干部下放了自已吃不开等思想，通过5次学习和讨论，这些思想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。在选择模范人物的时候，最好是用本地的人和事，群众容易接受，教育的作用更大。如社主任江滕华的大公无私、舍己为社的事迹；社主任辛时龙的大胆革新、不怕困难的事迹；乡支书黎海清下放后积极办好社的事迹；下放干部叶敦文团结帮助乡干、积极改变落后乡的事迹；光荣烈属徐大媽坚持革命的事迹等等。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原来怕艰苦、不愿下乡的干部，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了；原来不安心农村工作，有退坡情绪的乡干部，积极起来了；农民干部陈洪国听到自己要下放时说：“现在是由机关放到农村，将来是由农村放回老家。”当他学习了辛时龙、江滕荣的先进思想后，批判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，认为“党培养自己这几年来了，还有这么多个人主义的打算，的确对不起党”。下定决心到十里乡中心社安家落户，并积极想法办好这个社。解决了这个社很久以来就存在的不团结问题，整顿清理了这个社的财务工作，为这个社大大地发展了一批生猪。这个社过去每户只喂一头多猪，现在已发展到每户15.1头（编者注：要根据各地条件，具体研究每户至多养猪几头，并且要改进饲养与积肥方法，妥善解决饲料问题）。这个社的社员个个担心上级把陈同志调走了。

为了巩固下放干部的思想教育的成果，和加强干部的工作责任心，红安县委实行了下放干部层层包干、长期固定办社的办法。每一个干部除了本身的领导工作外，都包干一个农业社。要求对包干的社必须“包增产、包转变落后，包完成各项任务”。县委包干到区，区委（指导组）包干到乡，区、乡包干到社，社干包干到队。层层有人领导，社社有人负责。这样可以巩固

下放干部的工作热情并加强了他们的工作责任心。占店乡的干部说，下放干部、长期包干住社这个办法有5大好处：一是克服了干部对于办社的临时观点，加强了工作责任心；二是树立了干部热爱合作社和爱社如家的思想；三是能够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使干部得到了锻炼；四是便于干部参加生产，领导生产，密切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；五是克服了工作上的“事事大家管，事事无人管”的混乱现象，保证了正常的工作秩序。占店乡的党支部書記黃成忠1956年沒有包干办社以前，东跑西走，早出晚归；1957年包干民新社后，离家三里路，工作紧张时，一连三个月沒有回家一次。社員都说：“黃書記去年是老婆的卫士，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务員。”这个乡18个干部包干办社的结果，社社增加了生产，粮食增产将近3成，油料增产6成多，生猪由一户不到一头，增加到一头半，农副业总收入增加44%。

农村办社干部力量增强后，加上一些必要的政治工作和制度措施，下放干部的思想安定了，不再是“人在乡里，心在城里”，而是“人在城里，心在社里”，“人在社里，心在田里”。来城里开会的干部，有空就给社里打电话，住在社里的干部，清早一起来，就要到田里去看一看。八里指导組組長阮观胜，抗旱时在县里开了一天半会，一连给社里打了四次电话，詢問旱情，囑咐工作。下午散会还赶了70里路回到社里，家里还没去，就到田里去看庄稼，沒有手电，用手在田里摸，看有没有水，怕庄稼干死了。就是过去不安心农村工作的干部，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前面說过的“白天光腿觉，夜晚熬死人”的張汉兴也变好了，一年来长期住在同苏社，和社員同甘苦、同劳动，事事带头。社員都说：“張同志在我們社里干一辈子，我們也欢迎。”